

「家庭與遷移：越南女性移民在台的家務勞動分析」 博士論文計畫簡介

張書銘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一百年度博士生培育計畫得獎人

原先（99 年度）申請亞太博士生培育的計畫題目為：「除了『錢』之外：越南移民女性的期望與利他」，主要將重點放在越南籍移工和配偶的原生家庭結構、生活形態、社會經濟階層和性別分工的情況。但在訪談資料的取得過程中，有個令人深刻與反思的經驗，也因此現象使論文主題產生轉折。

由於訪談對象集中在工廠工與看護（監護工），¹所以有些訪談必須進入大多數看護的工作場所，也就是雇主的家庭。這其實讓我剛進入田野時產生些許排斥和不安，畢竟「家」在論述中屬於私領域，是許多公共討論無法觸及的場所；在空間上，極度強調隱私與領域性，對外來者採取一種排他的態度。所以在田野過程中，必須保持一種高度的敏感性與觀察力，有時雇主或受看護者會在旁「分享」我和移工的訪談，偶爾也會「分享」自己的看法，此舉雖然讓訪談無法照著預先準備的大綱走，但也因此認識移民家庭的複雜性及觸發可能的研究想像。從訪談經驗歸納，這些聘僱移工的台灣家庭類型，多為老年家庭（獨居老人或年邁夫妻）和三代同堂型；有移入配偶的家庭，則屬於核心家庭（中年夫妻和小孩）和三代同堂型。

¹ 目前台灣的移工類型主要有三種，分別為：工廠工、幫傭和看護。第一類工廠工，從事的也就是政府核准可聘僱外勞的 3K3 班（辛苦、危險、骯髒和 3 班制）類別產業；第二類幫傭，外籍幫傭引入政策經過兩度凍結現為緊縮，聘僱條件嚴格，須家中有 3 歲以下之 3 胞胎以上多胞胎者，或 6 歲以下和 75 歲以上（按年齡計算點數，未滿 1 歲 7.5 點、1-2 歲 6 點、2-3 歲 4.5 點、3-4 歲 3 點、4-5 歲 2 點、5-6 歲只有 1 點、75-76 歲 1 點、76-77 歲 2 點、77-78 歲 3 點、78-79 歲 4 點、79-80 歲 5 點、80-90 歲 6 點、90 歲以上 7 點，需滿 16 點才有資格申請）直系血親之雙薪家庭，這其實不太容易達到可聘僱標準。第三類看護，也就是監護工，雇主與受看護人為一定親等內，受看護人持有經社政機構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且屬「特定身心障礙項目」重度級以上者；或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的專業評估，並開具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內含巴氏量表），認定被看護人需全日 24 小時照護者。因此，現在台灣所謂社福外勞指的就是以看護名義申請入台的移工，但其工作內容通常也包含了原先幫傭所設定的工作。

這反映了台灣人口結構趨於老年化，明顯地導致了家庭結構的變遷，亦即獨居老人和年邁夫妻家庭的增加，由於對看護的市場需求增加，政府開放引進外籍看護，藉以因應中產階層家庭的要求。研究指出，外籍幫傭的引進有助於中產階級女性免除家庭勞務的工作（Huang and Yeoh 1996；藍佩嘉 2004，2008），而不同階層的家庭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因應日益嚴重的老人問題，就像台灣的中低階層家庭只好迎娶外籍新娘作為解決之道（王宏仁 2001）。我們可以看到跨國女性遷移對補充既有家庭勞務不足的現象，但如何去論述其家庭內隱晦的再生產活動及難以撼動的性別分工體制？我嘗試以「移民理性—家庭選擇」作為分析概念，這一組分析概念可以適用在越南移民和台灣接受移民二者，也就是說移民個人的遷移理性，乃是透過家庭日常生活實作形成的選擇，此種家庭選擇的結果（經驗）是受到移民原生家庭和接受移民家庭的（再）生產活動所形塑，最後家庭選擇了得以維持運作的（再）生產方式。

那麼，如何發展出一個適切當前越南女性移民的理論工具呢？Douglas Massey（1990）回顧既有移民研究文獻，歸納為四類研究架構：第一是社會結構與成本利益模型（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cost-benefit model）；第二是社會結構與家庭策略（social structure and family strategies）；第三是長期觀點的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 in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第四是鉅視歷史觀點的累積因果關係（cumulative causation in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他橫切分析這些研究架構，指出文獻間爭論的焦點有四：時間的形塑（time frame）、活動的地點（locus of action）、分析的層次（level of analysis）及成因與效用（cause versus effect）。不過，他也認為這些爭論只是因為遷移的動力（dynamic）與自給（self-feeding）特性所造成的不同觀點。

怎麼去連結這些差異，他提出將傳統的成本利益模型放置在移民網絡（migrant network）的結構背景下來看，這樣就會把社會連帶（ties）考慮進來，形成一個移民與非移民的系統（比較途徑）。網絡行動的結構作用在成本利益計算的成本端（降低遷移成本），將會形成遷移的一股強勁動力，一個與移民有社會連帶關係者將增加其勞務遷移的可能性。網絡形式可能是日漸增多的國際移民中最重要的結構作用，移民網絡是人與人之間的連帶，透過親族、朋友與來自相同社群的人際保證，連結著移民、先行移民者、非相同血緣的移民及前往相同目的地的一群人。剛開始的移民行為可能有許多原因，但是一旦移民努力爭取到機會並跨越門檻時，他們會擴大移民網絡而促使遷移的成本降

低，與移民數量的可能上升；這些傾向明顯地強化與重複擴散在整個移民過程，並且包含所有的社會部門。這種反饋（feedback）的出現是因為：網絡是移民自身行動所創造出來的（Massey 1988：396-397，1990）。可以將遷移的過程理解為一種社會的行為（social product），特別是將移民連結到家庭及其成員，移民者不是單獨作移民決定的個人，其移民過程也不只是被政治或經濟力量所決定的，而是各種因素互動的結果，政治和經濟結構往往透過社會關係影響個人的移民行為（Boyd 1989：641-642；曾熾芬 1997：57）。Massey（1990）特地指出移民網絡造成勞務遷移乃是因為風險分散（risk diversification）的家庭策略，是對不確定狀態所採取的一種回應，他認為風險分散可以作為一個分析家庭策略的概念工具。家庭的策略不僅是為了增加財富與收入也要避免經濟福利的風險，實證上移民多會將部分薪資匯給家庭成員，這不僅是文化背景與期望使然，也是移民及其家庭的經濟自利行為。

行文至此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移民理性—家庭選擇」的實質內涵，移民理性是指利益極大化原則，其中包含哪些利益則是由個人所決定，無論是自利或利他的，而人們也會盡最大可能來預期自己行為所產生的不確定後果。然而，預期的行為仍然可能基於過去經驗，因為過去對於態度與價值能夠產生長遠的影響（Becker 1999：177）。理性是基於過去經驗和已得到的訊息，並非毫無根據而產生預期，縱然預期仍有可能產生不確定的後果。

在家庭選擇的定義上，家庭具有經濟生產和資源分配的功能，在複雜的遷移過程中家庭扮演個人和社會的中介機制，所以必須優先處理家庭在移民過程的角色。由於大多數移民者是年輕人因此需要家庭的資源協助，家庭也是社會構成的主要單位，含括親屬、風俗、價值和責任等個人立足於社會的社會化功能，它也可能有益於遷移，像是長子繼承制規範了只有長子具有繼承土地的權力，因此其他家庭成員便會被鼓勵遷移。她也認為許多研究證明女性的遷移經驗本質上是全然不同於男性的，這是因為性別是家庭和社會安排的重要原則（Harbison 1981）。

本文預設的「移民理性—家庭選擇」分析策略，乃是傾向中層（middle-range）分析層次，討論範圍集中在家庭制度變遷如何形塑移民個體。目前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詳細的討論留待之後發展。

參考文獻

- Becker, Gary。1999。《解讀偏好：用經濟學方法探究人類行為》（Accounting for Tastes）（鄒繼礎譯）。台北：遠流出版社。
-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 曾熾芬。1997。〈居留權商品化：台灣的商業移民市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36-67。
- 藍佩嘉。2004。〈女人何苦為難女人？雇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8：43-97。
- _____。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社。
- _____。2009。〈照護工作：文化觀點的考察〉。《社會科學論叢》，3（2）：1-28。
- Boyd, Monica.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 638-670.
- Harbison, Sarah F. 1981.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Strategy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p. 225-251 in Gordon F. De Jong, and Robert W. Gardner, eds.,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Microlevel Studi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ergamon.
- Huang, Shirlena, and Brenda Yeoh. 1996. Ties that Bind: State Policy and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Helpers in Singapore. *Geoforum*, 27: 479-493.
- Massey, Douglas S.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383-413.
- _____。1990. Current Items: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1): 3-26.